

“一带一路”为汉学研究带来新的历史机遇

本报记者 杨逸淇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应该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研究充分结合起来。世界对中国发展道路制度的兴趣与日俱增,这也是汉学研究新领域新空间。

日前,由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 2017“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全球 22 个国家的 26 名海外学者与国内 19 位著名学者,围绕“全球视野下的‘一带一路’”这一主题,就“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中国方案与全球治理”“共同发展与共同价值”三大议题进行具体探讨,研讨视角以对当今全球化的充分理解为基础,体现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代表的人文特性和历史特性。

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那么,什么是传统文化?对此,人们的回答向来见仁见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指出,有些人把所有过去的文化都看成传统文化,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我们讲的传统文化,应该是在中国过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发挥了作用,一般地来讲,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文化的这类文化。一位越南学者的发言,似乎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葛剑雄的观点。越南战略研究与国际发展中心主席阮玉长指出,中国古代制度文化对于越南有着深刻影响,而儒家文化对越南的历史尤其重要,早在 1070 年,越南就有孔庙和孔子像,在 15 到 18 世纪的时候,达到高峰。

法国文化部前文化事务总监吉耶斯认为,人性和文化这两个词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也折射出中国人最高的一些道德准则。“诚”,“仁、仁德”,这些非常关键的词都是中国文化的经典与基石。“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完美地形容了孔子对于仁的理解。吉耶斯用“人文主义”这个词汇来代指中国人所讲的仁德、仁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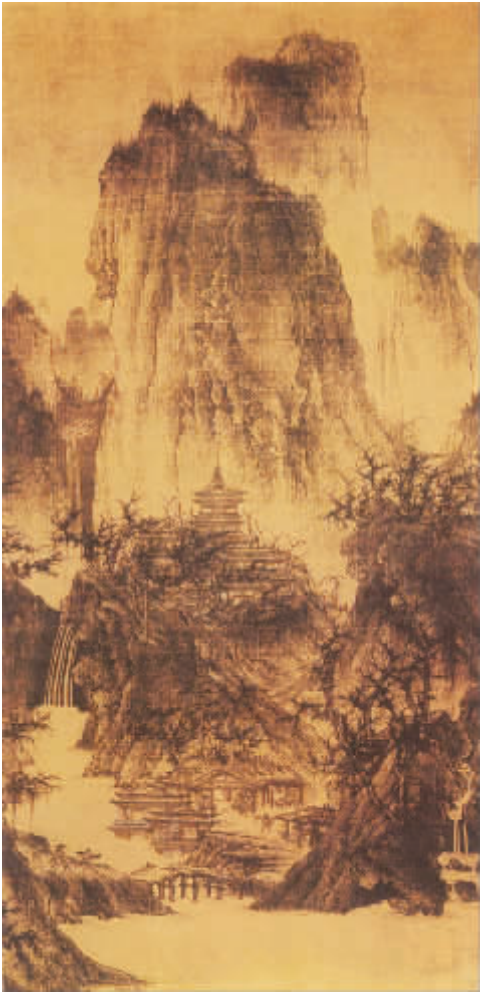
他指出,14—16 世纪的西方文艺复兴,是欧洲人对古典重新发现的过程。而一些中国传统的表达,比如“仁慈、仁德”,实际也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文化或古文中获取,这种双向主义或者平行主义是令人震惊的。

在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看来,中国文化能够贡献给世界的,主要是人作为人、群体作为群体、家作为家、国作为国的一整套精神价值伦理。这些精神理念的旨归,是使人成为健全的人,使群体成为和谐的群体,使家成为有亲有爱有敬的和睦的家,使国家成为讲信修睦、怀柔远人的礼义文明之邦。

20 世纪著名学者马一浮曾说:“六经”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特殊形态。刘梦溪近年主要研究“六经”,对此十分认同。在他看来,“六经”的基本价值理念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跟今天的社会发展目标有很多相和谐的地方。比如:仁爱、诚信、爱敬、忠恕、廉耻、和同等等。他认为宋代思想家张载的“哲学四句教”——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最好地解释了“和而不同”这个中国人对待世界的基本观念。他解释说:“仇”字,古代写作“雠”。“雠”是一种尾巴很短的鸟。“雠”字的象征意涵是:两只短尾巴鸟在那里说话,它们的话我们不懂,但是它们一定讨论得很热烈,讨论的结果不是这只鸟把那只鸟吃掉,而是和而解。“哲学四句教”对我们有很大启示意义,世界有差异,但是差异不必然发展为冲突,冲突不必然发展为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和而解的。

实践在发展,时代在变化。对传统文化光“照着讲”不行,更重要的是要“接着讲”,讲出时代的新意来。

对如何传承传统文化,葛剑雄强调,“传”是沿袭保持传统的文化、过去的文化;“承”是使这些文化在今天仍有生命力,就是要选择性地继承。从“传”的角度看,我们不必去判断它今天究竟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甚至不要考虑它还



五代时期张成《晴峦萧寺图》。兴盛于宋代的人文画欣赏门槛比较高。

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因为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比如精美的古代建筑往往保存在穷乡僻壤,无人注意,而今天应该有意识地去保存。对于“承”,简单地模仿古代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些人为了表示继承传统,一定要穿汉服,磕头跪拜,嘴里讲点文言文。其实,当年孔夫子说的也是口头话。所谓的汉服不过是当时的礼服,即使完全把它复原了,也不可能当今天的服装来穿。古代的价值观念或者一种思想、一种理念,我们应该根据现代的要求来重新解释,并且加以运用,进行创造性地转换。比如,孟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古代孝道的本质。中国的人口从公元初大概 6000 万左右发展到鸦片战争前 4.3 亿至 4.5 亿,其中孝道观念起了很大作用。今天,发达国家以及中国一些发达地区,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承担生育的责任。如果我们能够把传统文化的精华跟今天社会需要结合起来,教育他们,一个人本身必须承担对

家庭、对社会的责任,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文化的方法,多少解决我们人类所面临着的这样一个难题。因此,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应该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研究充分结合起来,使之能够在更广阔的时空里成为年轻一代所接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

宋代是人类历史上更早的文艺复兴

直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武功不及汉唐的朝代给盖棺定论了。人们仿佛记不得陈寅恪先生对宋代有过这样一段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有不少海外的汉学家却从文明的角度,对宋代不吝赞美之词。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宫崎市定认为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被许多美国高校采用的历史教科书《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有一章的内容宣称“中国最伟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

作为艺术历史学家,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东亚部主任马麟在演讲中坦言,要为宋代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正名”。他亦把宋代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马麟指出,在西方一本著名的艺术史专著中,关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内容有 140 页,讲的大概是 170 年的文艺复兴。而宋代有 300 年,在这本书上仅仅占了 7 页,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他强调,如果我们把宋代跟意大利以及整个欧洲那个时期的文艺复兴来作比较,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共同性。

的确,回望历史,宋代的科技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宋代也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时代。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可谓是百花齐放。这些都为马麟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是美国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以大量极具价值的亚洲艺术作品馆藏著称。东亚部中国馆全部常设展品近 500 件,其中宋代书画虽只有 20 幅,但皆为精品,其中包括《晴峦萧寺图》。“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作为一名西方博物馆中的中国艺术策展人,马麟对《图画见闻志》的这段话印象深刻。他认为,这个时期的文明是由风景画所描述的,在视觉艺术上,宋代是非常大胆的。宋代开始出现大量风景画,而这其实比人物、静物更难,完全可以媲美此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创作。但通过观察,马麟发现,大部分西方观众都特别容易欣赏佛像和陶俑,因为其于西方艺术里的古典雕塑相近,而宋代书画以及瓷